

财金视野

央地权责清晰确保公共服务到位

知识产权的宏观管理、授权确权、运用促进以及保护,属于中央还是地方财政事权,由谁来承担支出责任?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知识产权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上述一系列事项得到明确。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改革,既密切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又直接关联公共服务、百姓民生,值得关注。

何谓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作为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主要应明确“事该由哪级政府干,钱该由哪级政府出”。财政事权是一级政府应承担的运用财政资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任务和职责,包括国防、外交、国家安全以及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等;支出责任则是政府履行财政事权的支出义务和保障,“谁的财政事权谁承担支出责任”。很显然,只有合理、清晰地划分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才能更好地确保各级政府有效履行职责,特别是更到位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改革持续推进,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逐渐明确,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改革初步构建起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体系框架。同时,政府职能定位不清、

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各个领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这项改革向纵深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将进一步提升,民生保障网也会更密更牢。

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不尽合理、职责交叉重叠等问题还较为突出,典型表现是在公共产品提供中政府“越位”“缺位”现象并存;一些基层政府承担过多支出责任,形成“小马拉大车”“上面点菜,下面买单”等。2016年国务院发布指导意见,进一步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此后,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以及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生态环境、应急救援等分领域改革方案相继出台。

如何优化政府间事权和财权划分,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得到更有保障?受益范围原则、信息复杂程度原则、激励相容原则,成为政府间财政事权划分的3个原则。受益范围覆盖全国、外部性强、信息复杂程度低的全国性公共产品和服务作为中央事权,受益范围地域性强、信息较为复杂,且主要与当地居民

密切相关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则作为地方事权。此外,跨省区市的的基本公共服务由中央与地方共同负责。

此次出台的知识产权领域改革方案,从知识产权宏观管理、授权确权、运用促进、保护、公共服务、涉外工作、其他事项等方面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体现了受益范围、信息复杂程度、激励相容等原则,加强中央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财政事权,发挥地方管理区域内事务的优势,赋予地方更多自主权。比如在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方面,将地方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知识产权信息在地方的传播利用和融合应用等,确认为地方财政事权,由地方承担支出责任。可以说,改革方案对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以及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水平,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改革不

仅仅是宏观上的国家治理,也与百姓民生息息相关。比如,教育领域改革方案明确了“义务教育、学生资助、其他教育”3个方面的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对经费负担进行了明确详细的规定,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一目了然,有利于确保财政教育投入持续稳定增长,让教育事业更有保障。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其中明确“要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各个领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下一步,有必要在已推进改革的基础上,加强与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相关改革的协同配合,形成良性互动。另外,应总结改革经验成果,研究制定政府间财政关系法,提高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法治化、规范化程度。这项改革向纵深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将进一步提升,民生保障网也会更密更牢。



马一德

促进演出市场长久繁荣

年 巍

为了一首歌,奔赴一座城,成了过去一年很多人的选择。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前三季度,大型演唱会、音乐节演出场次达1137场,观众人次1145万,平均跨城观演率超过60%。

话筒一响,黄金万两。以演唱会为代表的演出市场表现活跃,为消费市场带来新活力。2023年前三季度,全国营业性演出场次达34.24万场,较2022年同期增长278.76%;演出票房收入315.41亿元,较2022年同期增长453.74%。这样的数据增长,是基于供需双方的“双向奔赴”,也是消费复苏的生动注解,更反映出人们对文化和娱乐的需求在不断增加。

演出市场已成为当下拉动城市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这个“行走的GDP”,背后承载着国人的“吃住行游购娱”,触角延伸连接到多个产业,带动周边产业产值增长。从交通食宿、旅游景区到实体店销售甚至个体摊贩,应有尽有。比如,南宁为了演唱会能够迅速落地,推出“一次性审批通过”的新政策;济南为解决演唱会期间的交通需求,临时开通定制公交专线,延长地铁运营时间;海口在演唱会期间,小半个城市都被打造成歌手主题……从优化审批流程到立体宣传包装,再到细致用心服务,各地推出

一系列实实在在、周密到位的政策举措,力争使“流量经济”转化为文旅消费的“存量经济”。

在繁荣发展演出市场的同时,一些切实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例如广告诟病的“黄牛”炒票、倒票。为此,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此前联合印发有关通知,明确大型演出活动实行实名购票和实名入场制度,演出举办单位应当建立大型演出活动退票机制,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门票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85%,以遏制演出市场乱象。不过,把措施真正执行到位,不让黄牛“牛”下去,需要各方久久为功。

当然,“安全”这根弦一刻也不能放松。大型演出活动期间,往往人员密集,安全风险点多,必然对安全监管和服务保障提出更高要求。对于地方有关部门来说,无论是保障公共安全,还是维护消费者权益,抑或是促进文旅消费健康发展,做好风险评估、做好活动预案,都是做大做强演出市场的关键所在。

综上所述,各方应努力行动起来,自觉地维护产业生态,不断完善规范市场,不仅仅满足于“票卖光、人坐满”的那份热闹,让演出市场长久兴旺下去。

(中国经济网供稿)



徐 骏作(新华社发)

要让好山好水有价 提升购票体验

2023年以来,全国各地积极推动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加快完善集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等于一体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显著成效。有的地区采用“生态资源指标及产权交易”的模式,促进了生态产品价值向经济发展优势的转化;有的地区采用“生态修复及价值提升”的模式,带动了周边区域发展和资源溢价;有的地区采用“生态产业化经营”的模式,大幅增加了优质生态产品的生产能力。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对于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发展的意义不言而喻。

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标准和体系不统一,核算技术不完善。当前区域间核算指标、核算方法、技术水平、数据来源和统计口径等方面存在差异,导致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结果缺乏可比性,加大了区域间生态产品价值评估和比较难度。同时,部分生态产品产权界定不清晰,产权边界模糊,产权供求主体不明确,生态产品主体权责利无法统一,制约了生态产品的市场化交易,等等。有鉴于此,应多措并举,让好山好水有“价”。

一方面,推动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标准化和统一化,搭建多层次生态产品交易平台。根据生态物质产品、生态调节服务产品、文化服务产品和公共性生态产品等不同类型的生态产品,构建个性化和细化的评价和测度指标,增强

生态产品采用不同的价值核算方法,对于产权清晰的生态产品采用市场价值法等直接市场法,对于数据难以获得的生态产品采用意愿调查法等更加灵活的方法,增强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的科学性。建立信息公开、市场透明、规则合理以及竞争高效的生态产品市场交易中心,统筹推进用能确权与跨区域交易等工作,加快建设全国用能权交易市场。

另一方面,建立多元化生态金融体系,创新绿色金融服务工具。建立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共同融资的多元化生态金融体系,对于公共属性较强的生态产品,在政府主导的基础上应联合绿色PPP、中长期绿色债券等渠道进行多渠道融资,对于市场回报率较高的公共私人产品,在政府主导下充分发挥生态信贷、生态产业投资基金、短期绿色债券的作用。避免以生态文明建设的名义违法占用耕地。严格遵守用地用途变更手续,加大对违法占用耕地进行生态文明建设行为惩罚力度,杜绝非法占地、虚假复耕等行为。

此外,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发掘生态产品特色和目标客户群体,实现精准营销和差异化营销,促进品牌塑造和营销推广。通过数字技术赋能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科学测算生态产品价值,建立多层次多维度的生态产品价值数据库,改进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评价指标体系和核算方法。

国铁集团近日发布通知,自1月3日零时起,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推出“购票需求预填”和“火车票起售提醒订阅”两项新功能,旅客通过铁路12306官方平台购票将更加方便快捷。当前,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对出行的需求也越来越高。作为重要的交通运输方式之一,铁路在人们的出行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铁路售票是铁路运输的关键环节之一,需要不断发展与优化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出行需求。此次新功能的上线,不仅有助于提升铁路客运的服务质量和效率,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购票难、购票繁的问题,为构建更加公平、便捷的出行环境奠定了基础。接下来,铁路部门应不断完善购票系统的功能和服务质量,不仅要注重技术的更新和升级,更要关注旅客的实际需求和体验。

(时 锋)

高水平建好用好自贸试验区

程时雄 刘树家

前不久,京津冀三地在雄安新区共同签署《京津冀自贸试验区协同发展行动方案》,共同发布系列协同创新成果,以务实举措推进京津冀三地自贸试验区协同发展。当前,各地自贸试验区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在不断进行差别化探索的同时,谋求合作,持续释放制度创新红利。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自上海自贸试验区设立以来,我国先后分7批设立22个自贸试验区,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多年来,自贸试验区通过开放政策的创新与实践,形成了许多标志性、引领性制度创新成果。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自贸试验区共向全国复制推广302项制度创新成果。2023年上半年,自贸试验区以不到四分之一的国土面积,贡献了占全国18.4%的外商投资和18.6%的进出口贸易,为我国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发展动力。

区建设方案以及一批含金量较高的政策文件,累计部署3400多项改革试点任务,涉及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政府职能转变等,形成较为完善的自贸试验区政策制度框架体系。一方面,放宽市场准入等政策有利于吸引大量外资以及国内投资,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法治化管理模式能为企业提供稳定和可预期的法律环境,推动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在自贸试验区的示范带动下,我国营商环境显著改善,外资开放幅度明显扩大,产业结构布局不断优化。

当前,在自贸试验区建设过程中,依然存在一些短板弱项。比如,机制创新呈现出“小修小补”趋势,在承担风险压力测试、率先推进制度型开放等关键任务方面有待深入推进,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系统集成性和重大突破性改革创新亟待提升;不少自贸试验区产业基础较为薄弱,缺少高新技术以及新兴产业支持;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还不够,特别是金融、教育、医疗等领域面临的限制较多;等等。对此,要迎难而上,从产业和企

金融工具尤其是保险,对于实现知识产权的无形财产价值、激发科技创新活力、优化营商环境具有重要作用。一段时间以来,随着保险机构改革步伐的加快,知识产权保险的产品与服务日益丰富多样,从资金端延伸至产业链各环节,协助投保企业管好风险减量工作。知识产权保险已经成为不少保险机构的重要关注点。

当前鼓励发展知识产权保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知识产权保险能够直击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痛点、难点,有望全面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效能,优化创新营商环境。具体而言,我国知识产权保护面临多个层面的问题。首先,企业更加重视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领域仍存在侵权易发多发和侵权易、维权难的现象,有效保护知识产权成为众多创新型企面临的一大难题。其次,伴随着“版权流氓”、恶意抢注商标等不良现象的出现,知识产权滥用问题凸显,给企业自由经营带来了一定负担。此外,在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知识产权侵权诉讼已经成为海外对手“狙击”中国企业的常用手段。

作为一种事前风险防控管理手段,知识产权保险可以有效化解知识产权保护中的风险负担,成为企业知识产权风险管理的有效工具。从全球知识产权保险发展经验来看,知识产权保险包括进攻型保险和防御型保险,进攻型保险承保范围包括被保险人面临侵权时的维权费用,可以有效解决维权难、成本高的问题;防御型保险则在被保险人善意经营的前提下,承保被他人提起知识产权侵权诉讼而支出的法律费用,保障企业在面对专利“丛林”、海外侵权风险时能放心经营。在市场充分发展、体制运行顺畅的情况下,知识产权保险能够有效帮助企业降低知识产权转化、运用、保护各阶段降低风险成本和知识产权维权成本,为知识产权市场公平竞争提供良好秩序保障。

我国知识产权保险业务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2009年国内保险市场才出现首款专利保险产品,但在有关部门大力扶持下,我国知识产权保险飞速发展,已覆盖专利、商标、著作权、地理标志、植物新品种、商业秘密等所有知识产权类型,涵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各个环节。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全国超过22个省、99个地市开展了知识产权保险业务,累计为超过2.8万家企业的4.6万余件专利、商标、地理标志以及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提供了逾1100亿元风险保障。

不可忽视的是,我国知识产权保险事业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同样突出。整体而言,我国知识产权保险仍处于试点探索阶段,国内只有少数保险公司推出了知识产权保险产品,知识产权保险的市场化推广仍存在参保率低、保险公司参与度低、不敢承保、保费高保障低等问题,经营主体目前对于知识产权的接受程度不高。知识产权保险推广难的根本原因,在于知识产权保护过程的专业性、复杂性导致对价值风险难以进行精准测算,知识产权本身的无形性决定了资产评估困难,企业经营过程中的道德风险往往难以把控,他人侵犯知识产权的风险概率也很难预测。

可见,知识产权保险事业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方协同配合推进,拥抱这一“新蓝海”。一方面,努力推动知识产权保险事业专门化发展。在政府层面,应当充分重视知识产权保险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意义,将知识产权保险纳入知识产权保护专项经费范围,通过政策指引、财政补贴、宣传教育等方式,推动、引导、扶持知识产权保险市场发展。保险机构要加强能力建设,优化投保收费理赔机制,丰富产品供给、创新运营模式、完善风险补偿机制,适应创新市场需求,供给高质量保险产品。

另一方面,针对性地促进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完善配套服务机制。要健全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体系,有序推进各类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标准规范制定,培育和发展知识产权专业价值评估机构,不断提升知识产权价值识别能力,为知识产权金融赋能。提升相关法律服务水平,在保险全流程建立保险与法律服务的深度合作,由法律服务机构提前做好侵权风险全面排查、保中提供风险防范、保后代为诉讼,以高质量法律服务将知识产权保护成本和风险最小化。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特聘教授)